

活 着

徐 飞

我飘着,飘在他乡
我活着,活在他城
我飘着,像一朵乌云
寻找失散多年的白云
我活着,越活越孤独
一朵又一朵白云
拒绝与我相认

徐飞,男,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安徽五河人,打工诗人。现在杭州下沙打工。

春天我挖了很多土

李明亮

那么多躲在角落里的盆盆罐罐
被我拖出来
它们置身小院的艳阳里
有些局促不安
一阵风赶过来
抖落它们沉积多年的心事

在树林,在田畴,在河畔
我一次次用小铁锄
挖来很多的土
黑的,黄的,干硬的
还有的像煮熟的糍粑般柔软
它们被我填进那些盆盆罐罐的肚子
然后戴上番茄、黄瓜、丝瓜、辣椒……

它们绿色的手掌一天天变得宽阔
踮着脚尖试探底部的温度和湿度
那两指高的夏天,对它们来说
多么漫长

李明亮,男,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安徽宣州人,打工诗人,现居浙江台州。

贴盲道的人

宋春来

一个给胶片和地板上黏合剂
一个把胶片粘在地板上
一个用小铁锤敲打胶片
他们是祖父、父亲和儿子

我静静地站在路边看着他们
看着阳光下的他们擦一把汗
看着他们喝几口水
看着他们默不作声
看着胶片盲道在不断地延伸

我好像看到盲人走了过来
而专心致志贴盲道的人
他们仍低头不语

宋春来,女,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广西贵港人,打工诗人,现在读学生。

粉刷工把汗水 刷在高楼上

贾录会

1
季节把所有的温暖
都拥进一朵盛开的花里
在亲人挥手叮咛声中
他们离开这个口岸
抵达到下一个口岸
这些外乡人
昨晚还在长江沿岸
今早就到了黄河边
他们用方言在城市里
成就一道风景 给
美丽的兰州粉刷着
准备开盘的楼房

2
一群支撑钢筋水泥的人
被耸立的楼房挤压着
他们站得高,看得远
相信梦会让桃花改变颜色
用长满老茧的手,给星光
砌着穹顶,为的是
让温馨能有一堵挡风墙
他们用一块砖,又一块砖
把城市撑向仰望的高度
阳光也懂事地触摸着
大口喘着气,把春天
留给故乡的他

贾录会,男,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甘肃镇原人,打工诗人,现在兰州建安公司打工。



刘祥

逃离学校

在那个下午,似乎注定了许多年里我像云朵一样漂泊的生活,年少的骄傲与轻狂也在浮华里不再有重量,就如习惯了把流浪当成自由一样。
我出生在四川盐源县的一个彝族村庄,儿时的记忆模糊,只记得是个没妈陪伴的孩子。听老人讲,从不更事起妈妈就因爸爸有了我现在的后妈而离婚远去了,走时她带走了比我小两岁的妹妹,我留在了没有“妈妈”的家。后妈生了弟弟和妹妹。印象里后妈对我不错,不是那种“黑心”的女人,但毕竟不是亲妈,又是让亲娘离去的人,芥蒂难以释怀!

到了上学的年纪,我进了当地的小学。因为同学中很少有人能听懂汉语,老师教学和课堂上的教本都是彝文的。

因为老师鼓舞,初时的我学习积极性很高。后来,我偶然听到有同学说我是个没妈的孩子,心绪开始烦乱,渐渐无心学习,成了老师眼中的“坏孩子”——爸爸决定送我到盐源县城的爷爷奶奶家里,去县城的小学读书。

到了爷爷奶奶家,生活上我很受关照,但在学习上,之前老师的教学方法和现在的大不同之外,语言障碍是最大的问题。由于基础薄弱,加之习惯不好,尽管逐步克服了语言障碍,但成效微弱,降了几级还是没有质的改变,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学渣。

初三,家人搬到县城,我也像麦地的麦子那样一天天长高,临近期末,身高已有1.8米,家里不再把我当小孩。父母希望我能上好的高中,但以我的“学渣”能力只好去职业中学。我不是坏人,可在老师眼里我还是一个坏学生。

慵懒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飘走,直到有一天,发小小华的朋友阿三(在东莞打工)来找小华。阿三着装时髦,不时还冒一两句普通话。听他描述大城市里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再有东莞打工挣钱“特别容易”,小华心动了。第二天,小华约我同行闯荡,成也好,败也好,先离开这个总被老师罚站、上课只能穿校服的学校。小华说,东莞那边的工头会给阿三寄车费,我们直接买火车票出发就行了。

之后的一个下午,我放学回到了家,以学校要买



徐唯辛油画《工棚》 络英供图

保险为由,从后妈那里拿到了身份证,她并未起疑心。接着我跟妹妹说:“好好学习,听妈妈的话!”我给了她一个小拥抱!

广东·东莞

怀揣梦想走上了打工之路,但,生活哪里会这么简单……

拿到身份证的第二天,怀着忐忑的心,我们和阿三坐上了去东莞的火车。第一次坐火车感觉很新鲜,不知道过了多久,车到站了——我来到了这座希望和失望汇聚的城市!

当晚住在车站旁的小旅馆,等着见老板以及安排工作。躺在陌生城市的陌生床上,我心想:生活真的很奇妙也很无奈,几天前还在家乡,一眨眼却躺在了异乡的城市。我得坚强,没人会怜悯懦弱的异乡人。

第二天,在阿三的带领下见到了老板。我和小华被安排到东莞的黄江镇,在一家纸品公司上班。没有流水线,工作主要是粘合酒、烟等货品的包装纸片和纸板,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一小时5元钱,加班另算。如果每天加班两小时加上工资能拿到50元钱,我觉得不错,坚持一年就有近1.8万元的收入,除掉生活费,拿到1万元左右是可以有的。可外面很高的消费水平破灭了我的心,想存钱非易事。干了四五

个月,我依旧没什么存款。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有一天也在外打工的老表阿力给我打电话,听说这边挣不到钱,就让我去找他,他那边每小时挣8元钱。他在佛山,见面他盛情地款待了我,并说他上班的厂子待遇也不算好,两人决计一起寻个新厂。

不曾想这竟然埋下了祸根。之后因老表和工厂的合同没理清,我和老表一起被扣押在了一个黑屋里,逼着我们给家里人打电话要违约金。无奈之下,我们只能电话家人。在赔了5000元违约金后,两人狼狈地踏上了回家之路,第一次打工告终。

我想我再也不会去打什么鬼工了,从外面回来感觉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许多。爸爸在火塘边抽着烟跟我说:“拉则(我的彝族名字),不读书是不会有出路的,你再去上课吧。”

这次我很顺从,托人进了职业中学。毕业后又在凉山民族干部学校读了个中专,熬到了毕业就失业的那一天。没工作只能留在家里,整天无所事事,想到还有弟弟和妹妹在读书,里外都需要钱,我感觉自己在拖累这个家,内心隐隐的有些不安,出去打工的念头又在我脑袋里浮现了。

山东·石岛

这次叫我去打工的是后妈的妹妹——姨妈阿果,听说为了得到更多彩礼钱给舅舅娶媳妇,多年前她选择远嫁山东。

姨妈先是给我爸说那边挣钱容易,让爸农闲时带上我去她那里打工,虽然辛苦,但各方面有她照应,收入固定,忙的时候一天有300元左右的收入——这吸引我和老爸辗转几天抵达了山东石岛。

这次是在屠宰场打工,我们车间负责杀鸭子的流水线:把活的鸭子吊在架子上,宰鸭、拔毛、清内脏,所有东西都被精确分类。听老员工说,鸡毛卖给服装厂加工羽绒服,内脏给饭店,排泄物则卖给养鱼户喂鱼。

活虽不重但单调重复,腥臭和霉腐气混合在空气里,让我很难受。三天后,姨妈打电话给爸,让我上他的渔船帮忙。姨妈在渔船老板底下当船长,老板不常在,大小事都由他负责。听说出海打鱼我很想去,

打工者的故事 打工者的歌



舍不得打马天涯

吴基军

三月。
在青砖黑瓦的屋舍
我的父母,依然点燃旧年的柴禾
袅袅向上的炊烟,散淡成风
吹去瓦上薄雪,更吹去云天下的寒

春节贴上,至今还未褪红的对联
让越过篱笆的风,耳热心跳
家门口,父母合力种下的那株桃树
更是暖遍全身。终挣扎冬的束缚
抖落一身雪,由炊烟散淡而去的风
便在枝头长出了花骨朵

一夜春雨后,弱不禁风的桃树
丰满了起来,柔而软的枝丫
正托举一朵妖媚而妖烧的桃花
我的目光,无法移开
打马天涯的时间,只能一改再改

吴基军,男,生于1968年,湖北大悟人,打工诗人,现仍然以打工为生。

母亲

路志宽

贫穷,是一种顽疾
像母亲的风湿病
始终不肯离去
风外出流浪的日子里
白云习惯了留守
像白发留守在母亲的头上一样
不离不弃

思念是一缕炊烟
拄着风的拐杖
努力向上伸出头去,眺望

故乡,泥土,村庄,母亲
这些称谓,是一盆盆燃烧着的炭火
温暖我在冰凉人世孤寂的行程
古人讲: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娘啊,我要告诉您
您的心窝,就是我永恒的归宿

路志宽,男,河北大名,生于1980年,打工诗人,一直走在打工路途。

大年三十

邹本峰

二哥说大年三十去广州打工
二哥说广州天气热
女人冬天还穿裙子
二哥说老板很大方
每餐有烧鹅
大年三十给每个农民工红包
二哥说活不累
每天下工有热水澡
有电视看

二哥回来后
二哥说烧鹅没滋味
二哥说热水澡不舒服
二哥说穿裙子的女人没二嫂顺眼
大家都说二哥比以前黑了,瘦了
有人问二哥下次什么时候去
二哥不应声
拿筷子的手抖得厉害

邹本峰,男,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辽宁朝阳人,打工诗人,大学毕业后打工多年,现为教师。

我欠母亲一个远行

郑万明

每次出门
母亲总要站在村口
送我一程

母亲送我无数次
一次比一次远

愧疚的是,我送母亲一次
只送到村口的墓地
那短短旅途
竟站不下一排泪水

从此 一辈子想出一趟远门的母亲
她的夙愿像一扇沉痛的大门
在尘世上关闭了

这辈子
我欠母亲一个远行

郑万明,男,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甘肃天水人,打工诗人。打工多年,现为媒体人。

尘埋的都市风景

欧阳

无论天气好坏,站在陋室的窗口,我都能看见那个据说有500多米高、被称作“中国尊”的“棍子”,它比众多的所谓高楼高出一大截。这个应该是地标性的都会标签了。

在望京,SOHO是另一类标签,它奇异的外形确实与众不同,尽管有人戏称有点像三坨屎便,但并不影响业界对其刚刚逝去的设计师扎哈·哈迪德的崇敬。人们在走过或者是想到繁华都市的时候容易关联到这些宏大的丰碑,由之还会延伸到设计师、出资人之类的大人物影像,就像说到长城,通常人们想到的是秦始皇或是秦王朝,谁会想到那些搬砖运土的无名劳工呢?即便教科书提醒人们想到这些人,末了大家还是不知道这些姓什名谁的劳工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虽然他们的队伍是那么庞大。

有一次我去望京SOHO转悠,闲着没事就问几个店里的管事,谁知道没人能回答我的问题——他们只是店家的雇员,店铺及其名号都是老板的。是的,他们是打工的,尽管看起来和工地上的劳动力有

本质的层级分野,但实质上却近于同类。

记得一次在影院遇到一热情冲小哥,攀谈几句才知道,身为影院职业人员,却也是打工仔,工资不高,可总算是有收入的活计,父母在这边打工,过来了总不能啃老。

上周在饭馆里用餐,意外遇到故乡甯南的服务生,算是我的邻居了。

“怎么到这里来打工了?”
“奇怪吗?大厨、老板都是外地人,我怎么就不能来?大爷您的问题很奇怪。”

她说的很有道理,但我并不脸红。我想到住宅小区门口的张家口老汉,随着共享单车的发达,他自行车整修的业务日渐冷清,如果不是电动车继续支持,他“打工”的买卖还能继续吗?

周六体检,健康中心的服务生自然少不了外地人,想来大夫角色的检验主持人士应该不会,一问还真遇到了户口“外籍”的眼镜儿,他自认为是“打工仔”,当然,实际上可能就是。

回到小区,河北“农民工”,卖菜卖水果的两夫妇都没来,打工的保安说这些天不准来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是何人不准,倒是往日各色棋王喧闹的楚河汉

界冷清得有点异样,看到有几个穿橘黄色制服的清洁工霸占了一张桌子,想着“打工的人”,就凑过去问候他们的舒心。看起来应该60岁出头的清洁工原来都不到50岁,倒都是首都附近省份的北方人,家里还种着地啊。我有时候会想自己其实和打工者的差别可能只有户口那个纸本本。说给他们听,清洁工兄妹认为我纯属胡扯。

可能还是我想多了。形形色色的打工者并不会想自己是否被城市隐匿、忘记,他们甚至不想为什么城里人会和他们不一样,不想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很多打工者对未来是迷茫的,年轻的也如此。撇开简单的劳动,他们通常除了财物的积累外,并不会去规划自己大脑的未来,没有精心的学习计划,以便进到城市里的自己不仅在当下活着,在未来也能适应环境、职业的变化,就像传说的那些北京大学保安一样。

所有这些寻常可见,无处不在的“打工入”镜像,在我们脑子里的大事记却罕有点笔墨。

我是个没有优越心理的人,从小就是,不是因为自卑,而是喜欢大家都光着屁股在河里游泳的无差别样,只有喜欢《红楼梦》的人才热衷那些虚浮的所谓情趣和品味,就像曹雪芹在书中满地到处乱扔的

文人玩具。好在喜欢《红楼梦》的人在思想上和更倾心维吉尔、莎士比亚、普鲁斯特的家伙们差距甚大,这算是一种安慰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重要的不是谁(曹雪芹?普鲁斯特?)描述的情趣生活是我们向往、模仿的范式,而是我们应该有自我的认知和自我精神的独立。打工者,或者说这个集合体同样需要如此。

想到这些,不得不承认,大多数时候我确实不喜欢打工文学,但又确实认为作为一个(类)独立人格的自我辨识,自我审视,打工文学是现实必须的存在。当人们看见诸如“中国尊”那种表面影像的时候,确切而言,应该没有人会想到建筑及其链条上蚂蚁一样的大军,那些餐馆、商店和文化消费、城市维护等领域的庞大打工群体,很多时候甚至会自己漠视自己,真就成了被尘埋在喧闹城市里的无影风景。

作为城市里多如牛毛的芸芸大众,在英雄膜拜的文化语境下被忽视,抑或视而不见其实是常态,但打工者自己不能自我忽视,而是必须在自己的位置唱出自己的歌谣——不仅是去建设、发展地,更是书写、记录下大时代里姐妹兄弟们的生活轨迹……

